



# 解缙二修《明太祖实录》相关问题研究

谢贵安

**摘要:**解缙奉命总裁二修本《明太祖实录》时,面临篡位伊始的永乐帝朱棣迫切需要清除建文初修本的影响、巩固自己地位的复杂而险恶的政治环境,为应对此一局面,解缙理应拟定妥贴的修纂凡例和宗旨,尽量与当今皇上保持一致,然而解缙内心深处对“据实直书”的执念和保留,使其本人及二修本实录皆未获得朱棣的完全信任。在《修纂凡例》荡然无存的情况下,解缙的《进实录表》以及早年为朱元璋施政所作的评价,成为逆向推知和考证其预修实录时的修纂主题及其纲领的恰当文本。统领“百人之众”的总裁解缙,对馆中江西吉安府同乡的关注异于常人,在文集中多有记载,从而对官方公布的二修人员名单提供了印证、修正和补漏的依据。

**关键词:**《明太祖实录》;解缙;解缙《进实录表》;实录修纂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1.01.022

**收稿日期:**2020-02-12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资助项目“明清史学与近代学术转型研究”(16JJD770037)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谢贵安,男,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和明清史,E-mail: xieguian@126.com。

在实录体史书修纂史上,江西吉安府吉水人解缙(1369—1415)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作为《明太祖实录》第二次修纂的总裁,初膺大任,终遭猜忌,所修实录也遭抛弃。关于解缙二修实录之事,未见有专门研究之论著<sup>①</sup>,只有吴士勇《〈明太祖实录〉的三次修纂》<sup>②</sup>和邓因旸《解缙与〈明太祖实录〉三修本》<sup>③</sup>两文有所涉及,但吴文只是对笔者《明实录研究》<sup>④</sup>相关内容的抄写<sup>⑤</sup>而已,邓文则主要是谈解缙案导致三修实录问题。故本文之作,既为前人所未及,又超过旧作《明实录研究》之论述,有相应的学术价值。

## 一 解缙二修《明太祖实录》时所遇险境与纂修始末

明太祖朱元璋崩逝后,继位的皇太孙朱允炆改元建文,是为建文帝。自建文元年(1399)正月一日下诏修纂《明太祖实录》,至三年十二月一日该实录纂修完成。然而,次年六月发动“靖难之役”的朱棣,攻下首都南京,而建文帝则不知所终。篡位伊始的朱棣,本有千头万绪的事务需要处理,却率先审读了初修本《明太祖实录》,认为史官不顾是非,任其私见,导致遗漏和失实甚多,并在当年十月,也就是在他攻下南京的四个月之后,任命解缙为总裁,开始改修建文本《太祖实录》。

接手永乐皇帝所付修改《明太祖实录》的任务时,总裁解缙便遇到了一个巨大麻烦。因为要修改的实录是关于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史书,而且是永乐皇帝的死对头建文帝在任时所修。怎样做到既忠实于太祖

① 参见:孙文龙《建国以来解缙研究综述》,《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第15—17、20页。

② 吴士勇《〈明太祖实录〉的三次修纂》,《文史知识》2004年第8期,第106—111页。

③ 邓因旸《解缙与〈明太祖实录〉三修本》,《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9年第4期,第31—41页。

④ 《明实录研究》系笔者前后花费20余年时间完成的学术旧作,先后有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初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再版三个版本。

⑤ 参见:谢贵安《明实录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130、466—468页。

的历史,又清除建文帝打下的烙印、令当今皇上满意,是摆在解缙面前的艰难选择。虽然他是个人尽皆知的才子,但修史不是耍笔杆子和卖弄文采,既要遵循据实直书原则,又要遵照“三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原则,处在“走钢丝”一样的高危困境。稍不留神,就会摔得粉身碎骨。解缙面临的正是这种复杂而危险的局面。

清除建文帝在实录上的影响,就是要对初修本《明太祖实录》进行删改。所以,解缙主持的实录修纂,乃是对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版本的第一次改修,也是第二次纂修(简称二修)。在永乐八年解缙获罪后,疑心病很重的永乐帝于永乐九年又委任胡广担任总裁,进行了第二次改修,也就是第三次纂修(简称三修)。事实证明,解缙二修实录,处在建文初修和胡广三修之间,属于过渡性的纂修。但是,当时的解缙并未想到二修本最终会被否定。

朱棣篡改初修本实录的迫切愿望,令实际负责修纂的解缙深受压力。永乐帝在给二修时的两位监修李景隆和茹瑺所下敕令中,指责“比者建文所修《实录》遗逸既多,兼有失实”,声称“朕鉴之,诚有歉焉”,要求史臣“重加纂修,务在详备”,既要“仰答先朝宠遇之厚”,也要“副予惓惓之孝敬”<sup>①</sup>,给监修者们以心理压力。这种压力,当然最终会传导至具体负责修纂的总裁解缙身上。次日,朱棣向全体纂修官员下达敕令,声称:“比建文中,信用方孝孺等纂述《实录》,任其私见,或乖详略之宜,或昧是非之正,致甚美弗彰,神人共愤,蹈于显戮,咸厥自贻。”<sup>②</sup>这已经是在威胁了,意思是如果你们修纂不力,也可能会像初修史官那样“蹈于显戮”。令解缙和史臣们恐惧的,正是初修《太祖实录》的一些史臣,就因为直书“靖难”之事,惨遭横祸。如初修《太祖实录》的纂修官叶惠仲,“以直书帝起兵事,族诛”<sup>③</sup>。

永乐帝的敕令已给二修实录定了基调。解缙要做的,就是按照皇帝的旨意改修实录,但同时也要顾及太祖皇帝的历史事实。这的确是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有鉴于此,解缙采用的方针,基本上是述而不作,尽量不表达自己的思想,只管照史料取舍,遵皇上指示编纂:“承命惶悚,日睹圣明之事,手授传信之编,璿坡螭陛之书,无庸黼黻,石室金滕之秘,不费讨论,但日食大官之膳,又时承异数之褒,虽尽力于期年,实无加于毫末者也。”<sup>④</sup>反映出解缙等史臣不敢有丝毫的个人主张。他在《进实录表》中也表达过“惟务校讎之事,实无黼黻之能”和“因文序次,莫抽(假)一辞之赞扬”<sup>⑤</sup>的态度。对于此次修实录,解缙同时认为是一个名随书传的机会:“圣寿齐天,一经行世,幸附姓名于不朽,仰惟日月之长存。”<sup>⑥</sup>

朱棣对二修史臣们是恩威并施,在警告他们不要“蹈于显戮”后的次月,便对二修实录的史臣们进行升擢,“升翰林院侍读解缙为本院侍读学士,侍讲胡靖(广)、编修黄淮、检讨胡俨皆侍读,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皆侍讲”<sup>⑦</sup>。书成前一个月,即永乐元年(1403)五月乙未,朱棣“以《太祖实录》将成,命礼部预定赏格”,并将二修实录的赏格定得高于修《元史》升赏之例<sup>⑧</sup>。解缙等修纂人员则不敢懈怠,“臣缙总裁、臣某等纂修,慎选多士,宴锡便蕃即开馆于禁中,屡翻阅于几暇”,可以说是抓紧时间编纂;并且利用各种史料充实内容,“发兰台记注之书,而征以藩邸之副,抽金滕石室之秘,又考于世家之藏”<sup>⑨</sup>。永乐元年六月,在解缙率领的史馆工作人员努力下,二修本《明太祖实录》修纂完毕,共为183卷,缮写成165册。为应对永乐帝改修的迫切心情,故该实录前后只用了九个月时间。尽管解缙自称“历期年之久”<sup>⑩</sup>,实际上不足一年时间。由于成书仓促,实际上埋下解缙等人获罪的伏机。

不过,当时实录进呈场面则比较热闹。监修李景隆、总裁解缙率全体纂修官上表进呈《明太祖实录》,而

①《明太宗实录》卷13“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己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233—234页。

②《明太宗实录》卷13“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庚申”,第234—235页。

③《明鉴》卷2《恭问惠皇帝》,印鸾章、李介人修订,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83页。

④解缙《解学士文集十卷》卷1《谢恩表》,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7册,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441页。

⑤解缙《解学士文集十卷》卷1《进实录表》,第440页。

⑥解缙《解学士文集十卷》卷1《谢恩表》,第441页。

⑦《明太宗实录》卷14“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己丑”,第256页。

⑧黄佐《翰林记》卷13《修书升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05页。

⑨解缙《解学士文集十卷》卷1《进实录表》,第440页。

⑩解缙《解学士文集十卷》卷1《进实录表》,第440页。

朱棣则用隆重仪式接受亡父的大典。前一天,设香案于奉天殿丹陛之中、表案于丹陛之东,设宝舆于奉天门。进呈当天早晨,史官将实录捧置于宝舆之中,由“监修国史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等、总裁官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上表进《太祖高皇帝实录》”<sup>①</sup>。进呈仪式完成后,当日便按所定赏格赏赐李景隆、解缙等 86 人,并在奉天门设宴庆贺,命公侯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国子监、应天府、太医院、钦天监堂上官作陪。对于这些厚重的赏赐,解缙在事后的《谢恩表》中也有提及:“大(太)祖皇帝《宝》、《录》告成,蒙恩赐臣等白金、彩币(币)、衣服、鞍马,加赐筵宴”,“锡以天闲之驷马,颁之内帑之金帛,荣及众,足其用,锦服焜煌,照耀都城之耳目,华筵沾醉,欢腾士庶之榆杨(揄扬)。臣缙等省己无劳,服膺莫报。”<sup>②</sup>当然,表中没来得及提到的,是朝廷对修纂官员的集体性升擢。但很快,永乐帝便对史臣加官进爵。如升纂修官吏部郎中徐旭为国子祭酒、太常博士钱仲益等为翰林院修撰,等等。

然而,这表面上的热闹,并不能抹平专制皇帝多疑猜忌的心理。二修本书成,并未完全令永乐帝感到满意和放心,最终导致监修李景隆和总裁解缙皆遭迫害。李景隆被夺去爵位,终身禁锢私第;解缙则先遭关押,后惨遭杀害。虽然解缙遇害也与朱棣猜忌他私结太子有关,但是《解家谱》坚持认为解缙被杀,是因为被“诬以私撰实录”<sup>③</sup>。尽管解缙在二修实录时,十分注意迎合帝意,但仍然不能完全达到永乐帝的要求。所谓“私撰实录”,意思是说解缙在二修实录时,兜售“私货”,以行己意。解缙曾表达过“据事直书,永示万年之大训”<sup>④</sup>的修纂原则,表现出他内心的某种坚持。也正因为如此,二修实录在遵旨诬饰上仍有所保留。永乐九年十月,朱棣在下诏三修时特意指出:“(李)景隆等心术不正,又成于急促,未极精详。”<sup>⑤</sup>这其中当然包括总裁解缙。如履薄冰的三修监修夏原吉、总裁胡广等,鉴前覆辙,不敢妄写一笔,完全“仰赖于圣断”<sup>⑥</sup>。直到朱棣表示“庶几稍副朕意”后,《明太祖实录》的修纂才终于尘埃落定。

## 二 解缙总裁《明太祖实录》时的修纂主题和纲领

解缙面对二修《明太祖实录》时险恶的政治环境,理应拟定一个妥贴的修纂纲领以作应对。依实录修纂惯例,纂修前必须撰拟一个《修纂凡例》作为修纂的纲领,用以表达修史主题。然而,现今流传的台本与梁本《明太祖实录》皆无《修纂凡例》,而《明太宗实录》以下实录多有之。这似可说明《明太祖实录》已为朱棣严密控制,反复修改之后,已不敢将《修纂凡例》示人,或到后来根本没有“修纂凡例”可言。没有《修纂凡例》,就难以直接获知解缙等人在二修《明太祖实录》时的修纂主旨。好在解缙在该实录修成后,附书呈上了《进实录表》,从该表中可以推知解缙等人修纂是书的部分凡例,窥见其修纂主题和纲领。

按明代修实录之例,书成进呈时都要同时呈上《进实录表》。表文一般由负责业务工作的总裁起草,如二修本《明太祖实录》的《进实录表》就由解缙起草,《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两朝同进之表文由总裁杨士奇撰拟,《明孝宗实录》的表文则由总裁李东阳拟定,三表均收在三人各自的文集之中<sup>⑦</sup>。解缙的《进实录表》主要有两个版本:其一是今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本)《明太祖实录》卷首所附的表文,由监修李景隆和解缙联合署名,其中罗列了各级主要修纂官员的名单和相应的职务;二是收在嘉靖四十一年重刻本《解学士文集》中的表文,将修纂官员的名单、职务省略,甚至干脆将监修李景隆的署名删去。这样做,是符合实际的。监修只负责政治监督,并不从事业务编纂,《进实录表》例由总裁撰拟,监修并不参与。

解缙的《进实录表》,是他对二修《明太祖实录》工作的一个总结,同时也可以说是他预修《明太祖实录》的纲领性文件。这种思想一是凝结在《修纂凡例》中,一是凝结在《进实录表》中。解缙就是按照这种思路进行

①《明太宗实录》卷 21“永乐元年六月辛酉”,第 386 页。

②解缙《解学士文集十卷》卷 1《谢恩表》,第 440 页。

③黄景昉《国史唯疑》卷 2《永乐》,陈士楷、熊德基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5 页。

④解缙《解学士文集十卷》卷 1《进实录表》,第 440 页。

⑤《明太宗实录》卷 120“永乐九年十月乙巳”,第 1516 页。

⑥《明太祖实录》卷首《进(太祖)实录表》,第 5 页。

⑦解缙《解学士文集十卷》卷 1《进实录表》,第 439—440 页;杨士奇《东里文集》卷 23《两朝实录成史馆上表》,刘伯涵、朱海点校,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336—337 页;李东阳《怀麓堂集》卷 69《进孝宗皇帝实录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50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727—728 页。



《明太祖实录》纂修的。在今日《明太祖实录》之《修纂凡例》尽失的情况下,《进实录表》的价值显而易见。

首先,在表中,解缙道出《明太祖实录》的修纂主题“显亲尽孝”,就是要让太祖像历代圣君那样扬名万世,并让永乐皇帝表达孝忱。他指出历代圣人都有史书以传名:“伏以圣人受命,启万世之鸿基,史氏纂书,示百王之大法。是故尧、舜之事载于典谟,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昭明日月,炳耀丹青,俾文献之足征,实古今之通议。”修纂实录的目的,则是为了让太祖扬名,以尽今上之孝:“矧创业垂统,皆在于诤谏,而继志述事,敢忘于纪载?鼎彝有勤,圣哲相承,铺张极盛之闳休,扬厉无穷之伟绩,历述前闻之作,允为达孝之规。”<sup>①</sup>这几句话说得有点委婉,直言之,将太祖事迹记述下来的目的是表达当今皇上的“达孝”。的确,在传统社会,为先帝行孝的方式,就是为他扬名,即所谓显亲尽孝。解缙在后来所上的《谢恩表》中再次强调“孝莫先于显扬”:“伏以史册光华,纪载圣神之实德,睿恩锡类,诞敷雨露之均恩。是知达孝爱其所亲,至仁不择所施。钦惟与天同运,如日之升,至孝为天所相,而谓孝莫先于显扬;至仁为众所归,而谓仁莫大于尊亲。爰自君临大宝之初,即下修史之诏,兢业万几之暇,不忘开卷之勤。”<sup>②</sup>显亲尽孝,成了二修《太祖实录》的基本目的和修纂主题。

其次,解缙在表文中对传主朱元璋的历史功绩一一列举。这些列举的事例,都是二修本实录记载的重点。他颂扬“高皇帝应千年之景运,集群圣之大成。天命眷顾之隆,起徒步不阶于尺土,人心悦服之固,未三年已定于京都”的起义成功过程,称赞太祖“华夏变(蛮)貊罔不率服”“山川鬼神莫不攸宁”的凝结各国、通灵鬼神的能力和功业,颂扬太祖“英杰不期而会,遐迹不令而从。尽收当世之贤才,大拯生民于水火。群雄归命,不戮一夫”的招贤纳士、救民水火的能力和仁心<sup>③</sup>,这些内容在二修本实录中有大量的叙述表达。表文中“元主遁荒,礼遣其嗣”<sup>④</sup>的陈述,正是二修本实录中俘获元诸孙买的里八剌<sup>⑤</sup>并以礼遣返<sup>⑥</sup>的写照。至于表中“中国先王之典,悉复其旧。传圣贤道学之统,守帝王心法之言。罢黜百氏,弥纶六经,范围化工,曲成万物”<sup>⑦</sup>的陈述,是对二修本中朱元璋恢复汉族风俗、崇儒重道的大量史实的提示。表文中的有些表述,如“四方幅员之广,亘古所无”,“天休兹至而就业贯乎始终,诸福毕臻而谦抑纯乎表里”<sup>⑧</sup>等,属于虚美;而有些表述则勾勒并突出了朱元璋与其他开国皇帝的区别,如“比于近古,邈焉罕俦。汉高年不登于中寿,光武运仅绍于中兴,唐高祖因隋之资,宋太祖乘周之业,元世祖席累世之威,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sup>⑨</sup>等。虽然朱元璋与汉高祖都属于白手起家,但汉高祖有福开国、无福享受,只当了7年皇帝、61岁即死去,与朱元璋在位30年、享年71岁是无法相比的。其他几个开国皇帝的成功也各有所凭,与朱元璋空无依傍不可同日而语。

再次,解缙在表中列举了《太祖实录》的另一个记载对象即副传主马皇后(孝慈高皇后)的各种美德:“天生圣善,克相肇基,侧徽德迈于嫔虞,开剑功超于胥[宇]。永协坤元之吉,夙开文定之祥,鸣鸠均众子之恩,螽斯奄百男之应,保合承天之庆,简能造化之仁。”强调她辅佐太祖成功的功业和懿德,特别是对她“诞育圣躬”的“功劳”反复强调,说“历考古之后妃,盖莫盛于周室,然攀任诞圣而无辅运之绩,邑姜辅运而无诞圣之祥”,指出周室后妃或“诞圣”或“辅运”,二者不能兼得,而将二者相兼的则只有明代马皇后一人。马皇后的辅运之功很突出,“若夫同起布衣,化家为国,调元翊运,参机赞谋,正位中宫,十有五年,慈训昭明,文德通理,家邦承式,天下归仁”;当然其“诞圣”之劳也功不可没,“诞育圣躬,万世永赖。目(自)古以来未之有也”<sup>⑩</sup>。解缙此说,完全是在对朱棣出身作粉饰。朱棣是皇四子,封燕王,其生母本为碯妃而非马皇后。《罪惟录》明载:“皇

①解缙《解学士文集十卷》卷1《进实录表》,第440页。

②解缙《解学士文集十卷》卷1《谢恩表》,第440页。

③解缙《解学士文集十卷》卷1《进实录表》,第440页。

④解缙《解学士文集十卷》卷1《进实录表》,第440页。

⑤《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癸酉、乙亥、丁丑”,第1041、1042、1045页。

⑥《明太祖实录》卷93“洪武七年九月丁丑”,第1621—1623页。

⑦解缙《解学士文集十卷》卷1《进实录表》,第440页。

⑧解缙《解学士文集十卷》卷1《进实录表》,第440页。

⑨解缙《解学士文集十卷》卷1《进实录表》,第440页。

⑩解缙《解学士文集十卷》卷1《进实录表》,第440页。

第四子棣生,母碩妃,皇后以为子,是为太宗文皇帝。”<sup>①</sup>解缙之所以这样处理,无疑是受永乐皇帝所画红线的限制。于是,马皇后“诞育圣躬”便成为二修本《太祖实录》的核心指南。如实录公然声称:“皇第四子生,即今上皇帝,孝慈皇后出也。”<sup>②</sup>

其实,解缙对二修《明太祖实录》的修纂主题之预设,可以远溯至太祖朱元璋在世的时候。解缙曾应明太祖朱元璋的要求,对朱元璋自己的施政情况进行过分析。这个分析,就成为解缙后来主修《明太祖实录》时的指导性纲领之一。据载,解缙中进士后,“皇祖亲加简拔”,选他为庶吉士,“读中秘书,日侍左右,特被宠眷”。一日,同处大庖西室时,太祖对他说:“尔缙试举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闻。”解缙便草拟以进,其略曰:

陛下得国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于群盗,救生民于涂炭,命将出师,皆受箴谏,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女宠、外戚、寺人、藩镇之患,消融底定。不迹声色,不殖货利,不为游畋,又远过汉唐宋之君,而无愧三代成王矣!<sup>③</sup>

此言虽然是歌功颂德,但也道出了朱元璋政治统治的某些特点,成为解缙在《明太祖实录》修纂时贯彻的指导性纲领。下面试作分析。

其一,“得国之正”的正统观念,在实录修纂中得到完满的执行。一般王朝更替后,都会出现后朝否定前朝的现象,但朱元璋则显得与众不同,并不直接否定元朝的正统,而坚称自己“得国之正”,即不是从元朝手中抢得天下,而是从“群雄之手”夺取政权,认为“群雄”(即解缙所说的“群盗”)推翻元朝,自己取代“群雄”,并声称明朝是承继元朝之正统。于是,解缙投其所好,将此作为修纂凡例,在《明太祖实录》中选择符合这一观念的史料<sup>④</sup>。

其二,基于“命将出师,皆受箴谏,不假(张)良、(陈)平,不倚(韩)信、(英)布”的定调,《明太祖实录》将朱元璋塑造成冠绝群臣的英明之主,特别是将他写成智慧超过他所谓的“孤之子房”的刘基<sup>⑤</sup>。

其三,由于“女宠、外戚、寺人、藩镇之患,消融底定”的基调,解缙在二修《明太祖实录》中将朱元璋关于“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执事侍巾栉。若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观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夫内嬖惑人甚于鸩毒,惟贤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为所惑者”<sup>⑥</sup>的一大段话写入其中,对处死驸马都尉司马伦一事予以公然记载<sup>⑦</sup>,还突出了朱元璋“定宦官禁令”<sup>⑧</sup>一事。

其四,“不迹声色,不殖货利,不为游畋”的定调,则为实录将朱元璋写成不近女色、不贪财富、不事游玩的形象提供了修纂指南。如为了贯彻“不贪财富”的主题,实录特地选择了朱元璋却蕲州所进竹簟<sup>⑨</sup>、却海贾回回所进番香蔷薇露<sup>⑩</sup>等史实予以表彰。虽然解缙将“不迹声色”的定性施诸实录的修纂之中,但朱元璋嫔妃众多,子女成群,有26个儿子和16个女儿的事实,使解缙等人对太祖“不近女色”的粉饰不攻自破。

《明太祖实录》在为朱元璋死后作总结时,所写赞语的基调便来自于早年解缙对朱元璋生前施政的归纳和评价。比如:“元政陵夷,豪杰并起,大者窃据称尊,小者连数城邑,皆恣为残虐,糜弊生民,天下大乱极矣。上在民间,闵焉伤之,已而为众所推戴,拒之益来,乃不得已起义,即条法令,明约束,务以安辑为事,故所至抚定,民咸按堵,不十余年间荡涤群雄,戡定祸乱,平一天下,建混一之功。”<sup>⑪</sup>是对早年解缙归纳的太祖“得国之

①查继佐《罪惟录》帝纪卷1《太祖高皇帝》,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更详细的考证,参见:潘怪章《国史考异》卷4《让皇帝》,《续修四库全书》第45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0页。

②《明太祖实录》卷8“庚子年四月癸酉”,第94页。

③以上引文,皆源自解缙《解学士文集》卷10《皇明阁学记》,第748页。

④参见:谢贵安《从朱元璋的正统观看他元蒙的政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第88—92页。

⑤参见:谢贵安、谢盛《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载与塑造》,《学术研究》2013年第5期,第101—110页。

⑥《明太祖实录》卷31“洪武元年三月辛未朔”,第535页。

⑦可参看《明太祖实录》(卷253“洪武三十年六月己酉”)第3659页的记载:“驸马都尉欧阳伦坐贬(贬)私茶,事觉,赐死。”

⑧《明太祖实录》卷74“洪武五年六月丙子”,第1355页。

⑨《明太祖实录》卷31“洪武元年四月辛丑”,第541页。

⑩《明太祖实录》卷79“洪武六年二月庚辰”,第1440页。

⑪《明太祖实录》卷257“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辛卯”,第3718页。

正”的阐释：“斥侈靡，绝游幸，却异味，罢膳乐，泊然无所好，敦行俭朴，以身为天下先”<sup>①</sup>，是对早年解缙归纳的太祖“不迕声色，不殖货利，不为游畋”的铺陈；“谨宫壶之政，严宦寺之防，杜外戚之谒，而家法尤正，纪纲法度彰明备”<sup>②</sup>，是对早年解缙归纳的“女宠、外戚、寺人、藩镇之患，消融底定”的铺叙。虽然我们用以印证的史料来自三修本《明太祖实录》，但是三修只是针对二修遗漏的敏感问题进行修改，二修时的基本面貌仍然得到保存。

将解缙的《进实录表》以及其对朱元璋生前所作的评价联系起来，似可窥见其缺失的《修纂凡例》本应表达的主题和纲领，这是研究二修实录的题中应有之义。

### 三 解缙对二修作者的印证、修正和补遗

解缙在二修实录的修纂人员中是领导核心和灵魂人物。虽然朝廷给他配备了监修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和副监修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忠诚伯茹瑺，负责政治监督，但修纂主题的确立、修纂凡例(大纲)的拟定、人员的分配、工作进程的掌握、文字的删润等业务事宜，都由他来负责。作为二修《明太祖实录》的总裁，下辖百人之众，又如此之繁忙，不可能对每个修纂人员都了如指掌和倾注关心，但是乡谊观念浓厚的他，对来自吉安府吉水县的老乡则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些人中，有些已被官史失载，但却在解缙的私人文集中得到详细的描述。

迄今所知，二修《明太祖实录》首发阵容，在署名为李景隆和解缙的《进实录表》中有比较详细的名单<sup>③</sup>。该表进献时间为永乐元年六月十五日。虽然是书成时所呈之名单，却是首发之阵容。关于二修《太祖实录》的人员，黄佐《翰林记》、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周应宾《旧京词林记》等书均有记载，与上表基本相同，只是补充了部分修成时的人员名单。此外，书成后，朝廷对修纂者进行了升擢，升擢名单反映了后期修纂者的情况。<sup>④</sup>

根据以上记载和其他史料，笔者在《明实录研究》中对二修人员作过统计，现列表展示如下：

监修：李景隆(小字九江)，太子太师曹国公；副监修：茹瑺，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忠诚伯。总裁：解缙(大绅)，翰林侍读学士。纂修官：王景(景彰)，翰林学士；李至刚(名刚)，礼部尚书；胡靖(原名广，字光大)、曾日章、王灌，翰林侍读；胡俨(若思)，翰林侍读；邹缉(仲熙)，翰林侍讲兼左春坊左庶子；杨荣(勉仁)、金幼孜(名善)、杨士奇(名寓)，翰林侍讲；李贯、吴溥(德润)，翰林修撰；杨溥(弘济)、郑好义，翰林编修；王洪(希范)，翰林检讨；张伯颖、王汝玉(名璘)，翰林五经博士；沈度(民则)、潘畿，翰林院典籍；王延龄，翰林院待诏；朱紘，给事；徐旭，吏部郎中；胡远，礼部郎中；端孝思，户部主事；陆颙，主事；钱仲益，太常博士；金玉铉，国子博士；王达，助教；蒋骥(良夫)，行人；刘辰(伯静)，镇江知府；邹济(汝舟)，平度知州；王褒(中美)，永丰知县；杨靛，知县；梁潜(用之)，阳春知县；赵季通(师道)，尤溪知县；沈瑜、唐云，知县；刘宗平、解荣，教谕；罗师程、傅贵清，训导；苏伯厚，晋府伴读；张显，靖江王府教授；吴勤，楚府教授；吴节，编修；李焯，广东按察司僉事；叶砥，僉事；端礼、杨孟力、朱逢吉、莫士安，儒士；钟子成、陈彝训、刘谦、沈文、梁逢吉、叶蕃、沈绍先、华嵩、乔岳、卫浩、郑中、余从善、陈俊良，监生；金寔、汪铸，生员；萧用道，靖江王府右长史。<sup>⑤</sup>

上述二修《太祖实录》的人员，据不完全统计，共有70人(以下简称“70人名单”)。但是，解缙的《进实录表》称，二修时共有“百人之众”<sup>⑥</sup>；而朝廷在书成赐宴时亦宣称，修纂人员有86人<sup>⑦</sup>。在这些修纂人员中，王景、杨士奇、李贯、端孝思、吴勤、吴溥、杨溥、杨荣还是建文朝初修《明太祖实录》时的修纂者。他们是两种版

①《明太祖实录》卷257“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辛卯”，第3719页。

②《明太祖实录》卷257“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辛卯”，第3719页。

③李景隆、解缙等《进实录表》，《明太祖实录》卷首。该表与《解学士文集》中《进实录表》有所不同，其中解集表中无修纂者之姓名，而此表则著录之。

④《明太宗实录》卷21“永乐元年六月丙寅”，第389—390页。

⑤谢贵安《明实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157页。

⑥解缙《解学士文集》卷1《进实录表》，第440页。

⑦《明太宗实录》卷21“永乐元年六月辛酉”，第388页。



本衔接的桥梁式人物。

解缙除了在《进实录表》中公开宣布修纂人员名单外,还在其个人著作《解学士文集》中提供了部分参与《明太祖实录》修纂的人员之信息,这些人主要是因为与他同乡的关系而受到关注。他提供的这些人员信息,可与上述70人名单相印证,甚至可作校异和补缺。

第一,印证。解缙在其文集中提到的二修实录的人员,可与上述70人名单相印证。名单中,有一位监生刘谦担任纂修官,由于位卑人微,其事迹人们所知甚少。解缙在其文集中,竟然提到了这位刘谦。因为同是江西吉水人,所以解缙对他比较关注。刘谦是处士刘本立(字子源)的孙子,与解缙同乡。早年刘本立曾指着刘谦对解缙说,将来扬名立家就靠此孙。刘谦“以后升国学,与修《太祖高皇帝实录》,令为中书舍人”<sup>①</sup>。70人名单中,还有一位楚府教授吴勤,是江西永新人,与解缙同为吉安府的老乡,因此也受到解缙的关注。解缙在文集中记述道:洪武九年,解缙父亲的朋友胡延平死于任所。作为胡延平的妻兄,吴勤来协助办理丧葬事务。当时年少的解缙跟着父亲一起,在胡家第一次看到吴勤,“见其英迈不辟,甚敬服之”。洪武二十年,解缙“始及拜先生于家,得闻余论,谦其平生”。此后又过了十余年,解缙“得先生于史馆”。在修纂《太祖实录》的史馆,一见到故人吴勤,解缙就联想到已故的父亲,颇为伤怀。每当吴勤“授教”时,解缙都“咸为之兴感”,而吴勤“亦念其故人之子,愈加爱厚”。不久,实录修成,吴勤蒙恩外调,死在任所。解缙“追平昔集次先生寄予书,大篇短章,词藻溢目,老成忠厚之情,及引教之意,不觉其感怆之至也!”所以,他“欲为先生述传”,在吴勤外甥胡光大所撰行状基础上,撰成了墓志铭。这时,解缙才对吴勤有了全面的了解。吴勤“幼敏悟,初学语时能识钱上字,人皆异之。十七八为文章,词藻天发”。洪武初,征天下名儒,吴勤应试,获中书堂第一名,授武昌府学教授。“永乐元年,与修《太祖实录》,特除开封儒学教授”。永乐三年二月卒,享年76岁。解缙称吴勤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尤善行楷书”,“在史馆时七十余矣,运笔如飞,馆中能书者数百人,啧啧称叹”。<sup>②</sup>可以说,吴勤的书法之长在修纂实录时得到尽情的发挥。70人名单中,还有一位吏部郎中徐旭,任实录纂修官。解缙专门为他写了一篇墓志铭《国子祭酒徐公》,对他作了全面的介绍。徐旭,字孟昭,是江西饶州府乐平人,做过吏部考功司官员,“综核名实”,“殿最严甚”,“棘棘不阿人”,找他说情官员“视其面,莫敢发口干以私者”。这种性格刚正之人担任实录纂修官,往往会偏向据实直书。对于他人馆修史过程,解缙叙述是“圣上即位,擢公郎中,与修《实录》成,擢朝列大夫、国子祭酒”。解缙还叙述道:“予尝与修《太录》,及纂书禁中,又见公之学问文章,过于其所设施者甚远,而考功之名迹又但其毫芒也。”解缙在与徐旭同修实录过程中,发现徐旭在实录修纂时展现出的学问,比他在任考功司郎中表现出的刚正更加突显。徐旭于永乐四年去世。<sup>③</sup>除了印证二修实录人员外,解缙文集还印证过初修《明太祖实录》的人员。

第二,校正。70人名单中的名字可能会有写错的情况,用解缙文集可以校正其中的错误。如二修名单中有“端孝思”,为户部主事,入史馆担任实录的纂修官。然而,解缙在《送端木武库归溧阳序》中则明确称此人为“端木孝思”,是复姓。永乐皇帝“临大宝之初,雅知端木公孝思名”,当时端木孝思出使朝鲜,“及还,与修《太祖高皇帝实录》,书成,受褒赏,升擢武库员外郎,偕奉训大夫。”解缙对这位年长的同僚兼下属也颇有好感:“缙以晚生,识公于洪武时,但知慕公之书,及见公之议论也,退而问于伯机先生,未尝不洒然自失也。由是辱公不鄙,敬之重之。后与同在史馆,同直文渊阁,早夜切磨,未尝不自为之深慰也。”<sup>④</sup>所谓同在史馆,就是共同修纂实录,两人之间有过交集,一起切磋问题。端姓来自端木复姓,皆为孔子弟子端木赐之后。但孝思究竟是单姓还是复姓,就应该辨明是非。解缙作为孝思的直接上级,他称孝思的姓是复姓“端木”,就为端木孝思之名提供了另一种写法。虽然《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二本皆为清代明史馆抄本)等书称其为单姓,作“端孝思”,但与孝思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且同在史馆中的人,多称其为“端木孝思”。除解缙外,金幼孜

①解缙《解学士文集十卷》卷8《处士刘君》,第679页。

②解缙《解学士文集十卷》卷9《吴先生》,第688页。

③解缙《解学士文集十卷》卷9《国子祭酒徐公》,第705页。

④解缙《解学士文集十卷》卷6《送端木武库归溧阳序》,第575页。

《金文靖集》卷4《赠端木孝思使朝鲜》<sup>①</sup>、金寔《觉非斋文集》卷28《书翠云山房卷后》(明成化元年唐瑜刻本)<sup>②</sup>均称孝思为“端木孝思”。2014年初,有记者在端木孝思的家乡江苏溧水发现了端木孝思之父的墓碑,碑名曰“明故先祖考刑部尚书端木公以善府君之墓”<sup>③</sup>。由此可证“端孝思”必为“端木孝思”,解缙文集所记无误。

第三,补遗。70人名单并非二修人员的全部,据解缙《进实录表》称修纂者有“百人之众”,故名单还有不少遗漏。解缙文集中的记载可以作某种程度上的弥补。在《故元邵武路同知萧公》的墓志铭中,解缙称自己对吉水人萧寅(字克钦)的事迹曾听先父说过,“欲为传其事”,巧的是“今子翰林检讨引高与予同修《太祖高皇帝实录》”;而萧引高听说总裁打算为己父写传,“感泣,奉状请铭”,解缙当然“不敢辞也”<sup>④</sup>。这里提到的萧引高,是萧寅的儿子,在永乐初做过翰林院检讨,是二修《明太祖实录》的人员之一。但萧引高在70人名单中漏载,解缙则提供了关于他同修实录的确切证据,可补名单之缺。解缙在文集中还讲述过廖钦(字敬先)修纂实录的事迹:“予友廖君敬先,奉诏起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既至而事毕,上曰:‘是老儒,即以为翰林检讨。’”<sup>⑤</sup>廖钦名义上是二修实录的人员,但70人名单中却只字未提。因为等到他到史馆就任时,实录已经修毕。

与《进实录表》这种官样文章相比,解缙在其私人文集中对上述二修实录修纂人员的记载充满了感情,也描绘得生动多姿。这些印证、修正和补充的二修人员,除了端木孝思是南京溧水人外,其他的全是解缙的江西老乡,其中徐旭是江西饶州府乐平县人,剩下的都是江西吉安府老乡,如吴勤是吉安府永新县人,而刘谦和萧引高两位则是吉安府吉水县人,与解缙是更为亲密的“小同乡”。顺带说一下,解缙还为初修《太祖实录》的人员王艮写过墓表,称他为“予友翰林修撰王君钦止,讳艮”,“预修《高庙实录》、《总集类要》,祁寒盛暑,终日不怠”<sup>⑥</sup>。王艮在“燕兵薄京城”时,誓不投降,“饮鸩死”<sup>⑦</sup>。解缙特写王艮,是因为王艮也是吉水人。正因为他们都是江西人,特别是吉安府吉水人,才获得总裁在私人著述中予以特记的殊荣。由此看来,解缙是位极重乡谊之人。

#### 四 结语

《明太祖实录》作为记载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官修专史,是洪武朝历史的史料基础,地位非常重要;解缙作为明初著名才子,口碑远播,深入人心,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智慧人物。然而,《明太祖实录》历经三修,聚讼纷纭;解缙才高八斗、深受隆恩,却下场悲惨,死于非命。无论是《太祖实录》,还是才子解缙,都会引发学者们进一步研究的兴趣。本文将二者结合,对解缙总裁二修本《明太祖实录》时所处险恶之政治环境及修纂过程进行重新探讨;在《修纂凡例》荡然无存的情况下,用解缙的《进实录表》逆向推测和考证他预修实录时的修纂纲领和主题,并用他早年对朱元璋施政分析为文本,证明它对实录修纂也具有纲领性的指导作用;更用人们较少留意的解缙文集中的史料,对二修《太祖实录》的人员进行印证、修正和补漏,对丰富和充实中国实录体史学或不无帮助。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金幼孜《金文靖集十卷》卷4《赠端木孝思使朝鲜》,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7册,第89页。

②金寔《觉非斋文集》卷28《书翠云山房卷后》,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30册,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229页。

③《明“刑部尚书”墓碑被当洗衣石三十多年》,原载《金陵晚报》,人民网2014年1月22日转载,2020年2月5日访问,<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0122/c172318-24198419.html>。

④解缙《解学士文集》卷9《故元邵武路同知萧公》,第693页。

⑤解缙《解学士文集》卷8《翰林院检讨廖君》,第674页。

⑥解缙《解学士文集》卷8《翰林修撰王君钦止先生》,第670页。

⑦张廷玉等《明史》卷143《王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047—4048页。